

《中国的一日》与《上海一日》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报告文学一直是少为人注意的一环，三十至四十年代，是报告文学发展得最蓬勃的时代，如钱杏邨的《上海事变与报告文学》、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塞上行》和萧乾的《人生采访》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著。其实，要谈中国现代的报告文学，绝对少不了《中国的一日》和《上海一日》。

一九三六年，由上海文学社发起编辑的《中国的一日》是茅盾主编的；助理编辑的是他的小舅子孔另境，另有编辑委员：王统照、沈兹九、金仲华、柳湜、陶行知、章乃器、张仲实、傅东华、钱亦石和邹韬奋等十人。

《中国的一日》由生活书店出版于一九三六年九月，可以说是三十年代中国文坛上的一件盛事。它的出版是受了高尔基所动议的《世界的一日》所影响的。这个计划选定了一九三六年五月二十一日为中心，向全中国发出征文启事，要求全中国的作家、非作家及社会上各阶层的人士，留心他这一天内，属于职业或非职业范围内所见所闻的一切事情，纪录下来，企图表现全中国这一天的全貌，作为中国在一九三六年五月二十一日这天的横断面。这个征文启事一发出，“五月二十一日”立即激动了国内外一切识字而关心祖国命运、而渴望知道在这危难关头的祖国的全面真面目的中国人的心灵，稿件从全国各地如雪片飞来，甚至在海外的

华侨，也不甘沉默而热烈响应，把他们在那一日的所见所闻纪录寄来，所收到的稿件超过三千篇，总字数达到六百万以上。

《中国的一日》原本计划出版的字数是五十万到七十万字，而收到的稿件居然超过六百万字，编辑部的人员都非常兴奋，经过第一次挑选以后，选定了八百六十多篇，字数计一百三十万字，仍大大超过了预算。由于经费所限，编者不得不忍痛割爱，再次选稿；经过一再的挑选，最后终于选定了四百九十余篇文章，编成了这部八十多万字的巨著。

近五百篇代表中国一九三六年五月二十一日这个横断面的文章所组成的《中国的一日》，为大三十二开本，精装一巨册，厚千余页，全书共分为十八编：第一编“全国鸟瞰”，由张仲实整理，选载了属于全国性质的五月二十一日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教育和体育事项。第二编是“南京”，选的是南京来稿。第三编是“上海”；第四编是“江苏”；第五编是“浙江”；江西·安徽”是第六编；“湖北湖南”是第七编；“北平·天津”属第八编；第九编则是“河北·察哈尔·绥远”；第十编“失去的土地”，是沦陷于日本人手里的东三省同胞的控诉；第十一编是“山东·河南”第十二编“山西·陕西甘肃”；第十三编“广东·福建”；第十四编“广西·贵州·云南·四川”第十五编“海·陆·空”是一些在火车、轮船或航机上的见闻；第十六编“侨踪”，是海外华侨的投稿，尤以香港为最多；第十七编“一日的报纸”，由孔另境搜集了是日全国各地有代表性的报纸百余种，把社论和特别的重要新闻，以及副刊上的文字，作了简单的提要；第十八编“一日间的娱乐”，选载了各省重要城市的电影、戏剧和播音等的节目。有以省作为一编的，有以城市作为一单位的，有以特别事项作为部分的……多姿多彩，琳琅满目。

本书所收的五百篇文章，几乎包括了所有的文学体裁，有短篇小说、有报告、有小品文、有日记、信札、游记、速写、印象记，也有短剧，可以说是集文学的大成。撰稿者除了小部分是有点名气的作家外，多数是从从来没有写作过的店员、小商人、公务员、兵士、警察……等，甚至社会

上各阶层的人物都有。在各编中，占分量最重的是“上海”；分量较少的是云贵等边远省份，至于新疆、青海、西康、西藏和蒙古则没有来稿，这是美中不足的地方。最感人的则是在“失去的土地”里表现的那群不肯屈服的灵魂。

五月二十一日是一个平凡的日子，然而，在这里所展示的我国的横断面，却告诉我们的民族是生活在一个不平凡的时代里，在这里我们看到：中国的农村在内在的和外来的摧残和侵略下崩溃而衰落；土豪劣绅如何假公济私，剥削平民百姓，以至凡有建设均变成了灾害；看到有多少热血男儿在干着保卫国土的神圣工作；看到……

茅盾在《关于编辑的经过》里说：

真的，这里是什么都有的：富有者的荒淫享乐，饥饿线上挣扎的大众，献身民族革命的志士，落后麻木的阶层，宗教迷信的猖獗……从中国的每一个角落，发出的悲壮的呐喊，沉痛的声诉，辛辣的诅咒，含泪的微笑，抑制着的然而沸涌的热情，醉生梦死者的呓语，宗教的欺骗，全无心肝者的狞笑！这是现中国一日的，然而也不仅限于此一日的奇瑰的交响乐！

然而在这丑恶与圣洁，光明与黑暗交织的“横断面”上，我们看出了乐观，看出了希望，看出了人民群众的觉醒；因为一面固然是荒淫与无耻，然而另一面是严肃的工作！

除了近五百篇文章以外，《中国的一日》书前还有蔡元培的序，和茅盾的《关于编辑的经过》，另有插图近百幅，作为各地实况的表现。

《中国的一日》是文化的一日；是觉醒的一日；是研究现代史不可少的一日；是有着五千年历史，伟大的中国一日的横断面。

《中国的一日》编辑出版的灵感来自《世界的一日》，而《上海一日》的出版，则是受了《中国的一日》所影响的。

一九三八年初上海《每日译报》的副刊《大家谈》和《华美周刊》的编者，为了吸收更多的文艺青年，进一步推广大众文艺活动，便和“上海美商华美出版社”合作举行一次全市性的征文，仿效《中国的一日》的方法，出版专集《上海一日》，以纪念八一三抗战一周年。经过了几个月的努力，终于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由华美出版社出版了一巨册的《上海一日》（大抵逃避检查制度或其他原因书后的版权页上故意错误地注明：一九三八年三月十日初版。）

《上海一日》的主编者是朱作同（朱祖同）和梅益。朱作同是华美出版社的老板，一介商人，对文学毫无认识，所以，实际的主持人就是《华美周报》的编者梅益和他的编委会：戴平万、林淡秋和殷扬等人。

《上海一日》不同于《中国的一日》般选定一日来做中心，它的范围是较宽的，其实大可称为“上海一年”，因为这里的每篇作品，描写的固然是上海一日间的事情，但全书所表现的，却是上海自一九三七年八一三起，至一九三八年八一三这一年的百态。这一年是伟大的、壮烈的、划时代的一年；这一年是纪念上海陷于敌手的一年；这一年是中国人以武力反击武力，以行动去保家卫国，展开抗战的第一年……为了维护人类的正义与和平，上海市三百万的市民，不分职业，不分年龄，不分性别地站在同一战线上，用沸腾的热血，写下了民族抗战第一年里，上海市各阶层民众的全面。编者在《本书的编辑经过》中说：

为要用集体力量把这复杂多样的现实描成一幅有血有肉的画卷，使全中国人民，全世界人类，以及后代的子孙都由此认识八一三抗战的真面目，我们才有编印《上海一日》的企图。

《上海一日》征文所得的稿件也非常多，共二千余篇，约四百万字。原本计划全书七十万字，但终因不忍舍弃精彩的文稿，而扩展至一百万字，五百余篇。本书也是大三十二开，精装一册，凡千余页，与《中国的一日》不相伯仲。书前有朱作同的序和编者的《本书编辑经过》；内文以文章内容的性质，分成四大部分。第一部“火线下”，内又分为“在前

线”及“救护与慰劳”等八辑，凡二十二万字，主要写八一三开始后，前线的战斗及其他的军事行动。第二部“苦难”，内分“南北东西”和“收容所”等五辑，共二十万字，描写死里逃生，流离失所，饥寒交迫的流民图。第三部“风火山上”，内分“大上海的火山爆发了”和“伟大的纪念”等九辑，写八一三战时战后，上海社会的各类活动，共三十五万字。第四部“漩涡里”，内分“在烽火中”和“在黑暗中争取光明”等十辑二十三万字，写上海各阶层人们在这动乱的一年中的生活实况。

投稿者就年龄来说 有五六十岁的老人 也有十三四岁的小孩子 但绝大多数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就职业来说，有学生、教员、小职员、家庭主妇，甚至女招待、妓女也有，所以，来稿的水准参差不齐，有很多还是很不通顺，而需要编者大事修改的。然而，在这些文章的背后，是活生生的实际经验，洋溢着火焰一般的爱国热情，是充实的内容，稚嫩的写作技巧一点也无损这些作品的感染力。《上海一日》初版一万册，可是流传却不广，手上所有的一册，还是影印本，极其罕见。

骤眼看来，无论征稿方法、编辑体例、出版形式，以至作品各方面，《上海一日》都极类似《中国的一日》。大家都是精装一巨册，都是由数百人合作的报告，但细看之下，两者之间是有很大差别的。

《中国的一日》集稿的范围是广大的全国，撰稿者均是全国的精英，它要表达的是全中国在一九三六年五月二十一日这一天内的民生百态，是伟大的中国一天内的横断面，编排的方法是以地域来区分的。而《上海一日》则只局限于上海一个城市里，范围是狭窄的，但时限却是较长的，它展现的是上海一年内各社会阶层的面影。《中国的一日》是整个中国的面，而《上海一日》则是中国一个点里的小立体。我总觉得叫《上海一年》远比《上海一日》来得贴切。

在内容方面说，《中国的一日》表现的是一个从封建社会觉醒，而努力学习民主的中国社会里的百态；而《上海一日》无论从横的或纵的去看，实在都是我民族陷于水深火热中的挣扎报告。

就作品的质量来说，《中国的一日》是大大地超过了《上海一日》的。前者的文章，无论在文字或技巧方面都较成熟，而且还有不少名家，如：陈独秀、黄炎培、陈子展、包天笑、罗荪……等支撑；后者则几乎全是新手的作品，技巧是粗疏的，文字也是欠流畅的。

虽然《上海一日》在多方面都有不如《中国的一日》的地方，但在历史的意义上，它是有一定地位的。

我曾经将《二十人所选短篇佳作集》和《第一年》作为展开抗战的分界线——一九三七年前后两面的文艺方面的代表作，而现在所介绍的《中国的一日》和《上海一日》也正好作为这个时期报告文学上的两个代表。

——写于一九八一年五月二十一日。正好是《中国的一日》的四十五周年纪念。

一九八一年六月四日、五日《星岛日报》

《中国文艺年鉴》

最近买到一册一九三二年度的《中国文艺年鉴》，虽然花了一百元，但亦物有所值，实在太少见。据赵景深在《现代中国文学研究书目》^①中指出，《中国文艺年鉴》曾共出过五年；一九三二年度和一九三三年度的，出版于“现代书局”，由“中国文艺年鉴社”编辑。自一九三四年起，则改由杨晋豪编辑；一九三四年度、一九三五年度和一九三六年度三册，均由“北新书局”出版；以后就似乎没有再见过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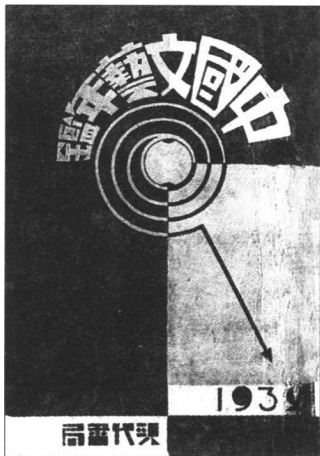
一九三二年度的《中国文艺年鉴》，是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本文艺年鉴。编者在“中国文艺年鉴创刊缘起”中，说明了编印的目的是“企图给我国文艺界每年摄一帧清晰的照片”使“目迷五色的读者能够一目了然。”^②

一九三二年以前，虽然曾有人出版过《小说年鉴》、《新诗年选》和《小说年选》等书，但它们的范围都是狭窄的，所选录的也并不公允，最重要的还是没有持续下去，只出了一次就算；况且，单选录作品是不足以称为年鉴的，因此，本书的编者企图把范围扩大。

我们在《文艺年鉴》中做了以下几项工作：（一）将一年来的文艺界活动情形做一篇简明的文字，给读者以清晰的鸟瞰；（二）给一年来的作家所发表的作品，单行本及杂志报章文字，作一编目；（三）将一年来出

① 见赵景深《文坛忆旧》（上海、北新书局、1948）页226。

② 见一九三二年《中国文艺年鉴》（上海、现代书局、1933）页1。



《中国文艺年鉴》，一九三二年度现代书局出版。

版的文艺书报作一编目。^①

以外，再加上当年度的作品选，这样便有别于一般的年选，而足可以称之为年鉴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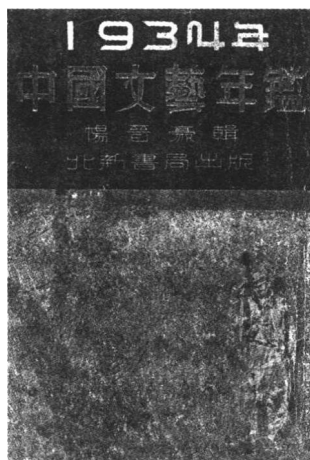
我手上的这本一九三二年度的《中国文艺年鉴》是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再版的；初版大概亦应在一九三三年内出版，两版共印了三千册，全书厚达八百余页，对这样巨型的厚书来说，一年内可以再版，销量已算是相当可观的了。

全书共分为三部 第一部是“一九三二年中国文坛鸟瞰”第二部是“一九三二年创作选”第三部是“作家及出版索引”。书前并有“中国文艺年鉴创刊缘起”及“编辑凡例”，简略地说出了编辑的原因及方法。

由于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变的发生，中国的文坛也随着各种事业一样的衰落。上海 甚至连带整个中国的文坛 都陷入了死寂的现象。《小说月报》和《北斗》相继停顿了，文艺刊物似乎根本不存在，单行书籍的出版，也成了偶然的现像，所以编者说一九三二年最初的四个月，中国根本是没有文坛的。及至五月以后，《现代杂志》和《文学月报》陆续出现，才为中国的文坛带来了春天，带来了一线生机。

虽然一九三二年的文坛醒来得太迟，但在质方面却不比往年低落。就小说方面来说，这一年内再没有了那种罗曼主义的、革命与恋爱互为

见一九三二年《中国文艺年鉴》（上海、现代书局、1933）页2。



《中国文艺年鉴》一九三四年度，北新书局出版。

经纬的作品；就是以个人的情感来使读者感动的那股歪风亦遭到了它衰落的命运。作家们都仿佛得到了新的力量般努力写作。郁达夫发表了中篇《她是一个弱女子》以及后来收到《忏余集》里的五六个短篇；茅盾写了《三人行》和《路》，短篇《林家铺子》和《春蚕》；废名则发表了《桥》和《莫须有先生传》……一九三二年的诗坛，则明显地分成三个流派，就是：以李金发和戴望舒为代表的象征诗派；继徐志摩以后崛起的，以饶孟侃、陈梦家和卞之琳为代表的新月派；与及以蓬子为主，还没有重要诗人的新兴阶级诗派。在文艺理论方面来说，一九三二年是蓬勃的，这正是“文艺大众化”和“文艺创作自由”发生争论的一年。理论界的口号多多，骂战杀得日月无光，至年终仍未了结……

“一九三二年创作选”又分为短篇小说、诗、散文和剧本等四部分。短篇小说共选了十八篇，包括了沙汀：《法律外的航线》、沈从文：《若墨医生》、东平：《通讯员》、郁达夫：《迟桂花》、茅盾：《林家铺子》、刘呐鸥：《赤道下》、穆时英：《公墓》及魏金枝：《前哨兵》等名篇，均收在内。诗方面则收有：卞之琳、朱湘、李金发、陈梦家、戴望舒、饶孟侃……等十家的十八首，其中戴望舒竟收五首之多。散文方面，仅选了：周作人的《苦茶随笔小引》、茅盾的《内河小火轮》、俞平伯的《中年》、梁遇春的《又是一年春草绿》、叶灵凤的《面壁绮语》和缪崇群的《我的病》等六篇。剧本选的最少，只有田汉的《战友》和蒋本沂的《一条战线》两个。

“作家及出版索引”又分“一九三二年作家著作索引”及“一九三二年出版文艺书目”两部。“一九三二年作家著作索引”以作家的笔名划数为序，先列出作家笔名，然后分行详列该作者在是年内所出版或发表的作品，如：

丁玲 彬芷(丛喧)

《法网》(短篇 良友)

《多事之秋》(彬芷(长篇)北斗二卷一期起)

《某夜》文学月报一卷一号

《消息》文学月报一卷二号

《夜会》(丛喧)文学月报一卷三号

《诗人》(以上短篇)东方二十九卷五号^①

这个编法的好处是我们很容易检查到某作家在本年内所发表的作品，所刊载的刊物，及出版的单行本。而且还可以因此知道某些作家的另一些笔名，如丁玲之用“丛喧”、“彬芷”；沈从文之用“红黑旧人”；周起应之用“绮影”；叶圣陶之用“郢生”；张天翼之用“铁池翰”；宋阳之用“易嘉”……都是较为人所少注意的。其缺点则是所收甚难齐全，而且，所选录的作家是用何种尺度来做标准的呢？亦颇耐人寻味。譬如：万曼、耶灵、金丁、文君……等，不知是否选得较为偏僻了一些？

“一九三二年出版文艺书目”则以性质来分成一理论、批评、史传、讲话；二创作杂集；三小说；四剧本；五诗；六散文等六类，无论创作、论著及翻译，均在所收之列，颇便于查阅；但仅以上海一地所出为主，其他地方的则甚少收入，未免不足。

我手上还有一本原版的一九三四年度的《中国文艺年鉴》，由杨晋豪编，是一九三五年二月付排的一九三六年四月的三版，北新书局版。这本书香港有人重印，很容易找到。全书亦厚八百余页，而共分为四大部分。

① 见一九三二年《中国文艺年鉴》(上海、现代书局、1933)页3。

第一部“二十三年度(即1934)中国文坛巡阅”内,又分为“一般的考察”、“本年度的中国文艺主潮”、“本年度的中国文艺论战”和“本年度的中国死亡作家”等四章。对本年的文艺主潮,如:破产农村描写的增加、历史故事的不断演现,战争小说的发表,幽默、闲适的小品文的极度兴盛和翻译工作的热忱,都有详细的介绍。论战方面,如:京派与海派之争、无法产生伟大作品之讨论、接受文学遗产的问题、小品文的提倡和攻击、文言白话和大众语的论战等,亦有详尽的报道。至于本年度内死亡作家的记载,资料则更为可贵,如朱湘、刘半农和庐隐之逝,除了附生平图片以外,更有亲友的回忆文字,如:赵景深的《朱湘》、苏雪林的《关于庐隐的回忆》和刘半农的儿女刘小蕙、刘育伦和刘育敦合写的《父亲的死》等。

第二部“二十三年度中国创作选”分成:短篇小说、新诗和散文三部,比一九三二年度的少去剧本一部。短篇小说选了巴金:《将军》,老舍:《上任》,冰心:《冬儿姑娘》,吴组缃:《樊家铺》,张天翼:《包氏父子》等十七篇。新诗则选了卞之琳、李金发、徐訏、臧克家、钱君匋等十四家的十八首。散文方面选得最多,亦划分得最清楚,分别有小品、记事、游记、日记、传记随笔等六种,凡三十一篇之多。

第三部“二十三年度内地文坛报告”,分为:北平、南京、武汉、广州、安庆、济南、保定、长沙、漳州、南通、松江和常州等十二处,分别详述了这一年内,当地的文化情况,并列介绍当地所出版的杂志,对研究者极具意义。就北平方面来说,即列出杂志《文学季刊》、《学文》……等十种,文艺副刊有《北平晨报》、《华北日报》、《京报》……等十四种;除了注明出版机构,编者、刊期外,还加以详细的介绍。就是边远的保定,亦介绍了它的“幽燕社”和《幽燕半月刊》,资料的详尽,可见一斑。

第四部“二十三年度出版文艺书目”则分开文学史编、散文、诗词、小说、戏曲、杂志等部,罗列了该年度内所出版的单行本,但没有注明出版社,较之一九三二年度的作用更少。

拿两本不同编者的《中国文艺年鉴》来做一比较，可谓各有短长：

一九三二年度的第一部“一九三二年中国文坛鸟瞰”，以单一篇文章，一气呵成介绍是年内文坛之演变，但嫌眉目不清，且因资料的缺乏而不够深入；但一九三四年度的第一部“二十三年度中国文坛巡阅”却采取了分类分事详述的办法，能做出较深入的研究探讨和报道，清楚明确得多了。

我极同意一九三二年度编者所提出的“单选作品不足以称为年鉴”的意见，然而，作品选得太少，读者亦难以了解该年的创作实况；尤其是一九三二年度的散文，仅选了六篇，实在少得令人惊讶。但一九三四年度的三十一篇却又有点过火，而且，不选剧本，似乎又有点美中不足了。

一九三四年度的第三部“二十三年度内地文坛报告”最能全面的代表整个中国文坛，为一九三二年度所无，则是更进的一大步。但若将其第四部的“二十三年度出版文艺书目”与一九三二年度的“作家及出版索引”相比，则又大为失色了。

总的来说，一九三四年度的《中国文艺年鉴》因有一九三二年度的作为蓝本，基本上是较为进步了一点。至于一九三三年度、一九三五年度的，至今未见，未知编成怎样，实感遗憾！

我总觉得，编辑“文艺年鉴”不是件小事，绝不应由个人，或一个小团体来编纂，而应由国家，或全国性的文化团体来负起责任，才不致演变成有偏见的或地区性的《中国文艺年鉴》。最近已见到地区性的《小说年鉴》^①出版，希望全国性的《中国文艺年鉴》能早日重新出版。

一九八二年四月五、六日 《星岛日报》

赵家璧编的两套文学丛书

在中国新文学的丛书里，有两套是很容易混淆的，就是“良友文学丛书”和“晨光文学丛书”。前者由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于一九三三年至一九四六年间，后者则由上海晨光出版社印行于一九四七至一九五三年间。

这两套丛书都是由赵家璧主编的。它们易使人混淆的原因是：编者相同、有部分重复、翻印版多、封面设计接近、形式相似。

这两套丛书我大部分都见过了，一般读者相信很少有见过全部的。现根据上海图书馆所出版的《中国近代现代丛书目录》所载，抄录如下，以供爱好者参考。“良友文学丛书”共四十四种：

1. 鲁迅编译《竖琴》、
2. 何家槐《暧昧》、
3. 巴金《雨》、
4. 鲁迅编译《一天的工作》、
5. 张天翼《一年》、
6. 蓬子《剪影集》、
7. 丁玲《母亲》、
8. 老舍《离婚》、
9. 施蛰存《善女人行品》、
10. 沈从文《记丁玲》、《记丁玲续集》、
11. 老舍《赶集》、
12. 陈铨《革命的前一幕》、
13. 张天翼《移行》、
14. 郑振铎《欧行日记》、
15. 靳以《虫蚀》、
16. 茅盾《话匣子》、
17. 巴金《雷》、
18. 侍桁《参差集》、
19. 丰子恺《车厢社会》、
20. 凌叔华《小哥儿俩》、
21. 沈起予《残碑》、
22. 巴金《雾》、
23. 周作人《苦竹杂记》、
24. 徐志摩《爱眉小札》、
25. 朱光潜《孟实文钞》、
26. 郁达夫《闲书》、
27. 谢冰莹《一个女兵的自传》、
28. 俞平伯《燕郊集》、
29. 叶圣陶《四三集》、



《爱眉小札》徐志摩著，良友文学丛书之一种。

30. 赵家璧《新传统》、31. 郑伯奇《打火机》、32. 沈从文《新与旧》、33. 丁玲《意外集》、34. 王统照《春花》、35. 鲁彦《河边》、36. 杜衡《漩涡里外》、37. 鲁彦《野火》、38. 茅盾《烟云集》、39. 张天翼《在城市里》、40. (缺) 41. 赵家璧译《月亮下去了》、42. 耿济之译《兄弟们》(第一部) 43. 沈从文《从文自传》、44. 茅盾《时间的纪录》。

其中《竖琴》、《一天的工作》、《月亮下去了》和《兄弟们》是翻译书，《新传统》是美国文学家介绍外，其余均为新文学作品。这套丛书中，以张天翼的《移行》、郑振铎的《欧行日记》、丁玲的《意外集》、俞平伯的《燕郊集》、谢冰莹的《一个女兵的自传》和鲁彦的《野火》最为罕见，其余的都很容易找到。

除了“良友文学丛书”良友图书公司还出版过十巨册的“中国新文学大系”；七十八种六十四开本薄薄册子的“一角丛书”；十六册五十开本软面精装的“良友文库”，十种“中短篇创作新集”；“现代散文新集”七种，和四巨册的“良友文学丛书特大本”。除了“一角丛书”中的部分外，其余几乎全部都是新文学作品。良友图书公司推动新文学发展的功劳实在不少。

“良友文学丛书”先出精装本，约请一流作家执笔，全部新创作，用软布面精制，米色道林纸印，书价不论厚薄，一律九角，试图对当时市上流行的纸面平装文艺出版界来一个突破，在书籍装帧上引进一点新东西。”（见赵家璧《回忆鲁迅给良友出版的第一部书》载《新文学史料》）



《大江》端木蕻良著晨光文学丛书之一种。

总第十一期。封面除软布精装外，还加上一张双色印刷的封套，后来出平装本时，即用此封套作为封面。精装本和平装本出版的日子相隔颇长，譬如赵家璧的《新传统》，精装本出于一九三六年八月，而平装本则迟至一九四一年五月才出版。精装本和平装本亦间中有少少改动的，如沈从文的《记丁玲》，精装本原有插图照片若干帧，但平装本则没有。

有一批平装版的“良友文学丛书”注明一九四四年“良友图书公司”出版的（没有注明“上海”）内文虽经重排，但粗制滥造，如施蛰存的《善女人行品》，原精装本内是有一篇序文的，但这个平装本却是连序文也取消了。图片可以删去，但序文则是万万不能删去的啊！

这套平装本的丛书，可以确定是翻印的伪本，因为原版本的平装版，通常是照精装的版样而不经重排的；扉页上惯有良友的标志——一个戴帽的农人在播种的图样。而且，良友图书公司，自一九三七年八·一三之役后倒闭，到一九三九年复兴时所印的书，均已用“上海良友复兴图书印刷公司”了。况且，一九四二年后，良友已迁往桂林、重庆等地，所出版之书，均注明在何处所出。上述四四年版的“良友文学丛书”虽用良友图书公司名义，但肯定是非法重印的伪书。

一九五七年间，香港亦有一良友图书公司，不知与原来上海的有无关系，它们从原来的丛书中，选了十五种重印出版，改成四十开本，称为“袖珍本”，书后附一重印缘起；此即为本港中最常见的“良友”版丛书。此香港版的“良友文学丛书”虽说有十五种，但常见的只有十种八



《流亡图》田涛创作，晨光文学丛书之一种。

种如陈铨的《革命的前一幕》叶绍钧的《四三集》、鲁彦的《野火》和郑伯奇的《打火机》均未见过，不知是否印齐？

一九四七年赵家璧出任“晨光出版公司”总编辑，为它们编印了二十二册的“晨光世界文学丛书”和“晨光文学丛书”三十九种：1.老舍《惶惑》、2.老舍《偷生》、3.(缺)4.巴金《第四病室》、5.巴金《寒夜》、6.徐志摩《志摩日记》、7.老舍《微神集》、8.钱锺书《围城》、9.师陀《结婚》、10.赵家璧译《月亮下去了》、11.王西彦《村野恋人》、12.端木蕻良《大江》、13.耿济之译《卡拉马助夫兄弟们》、14.老舍《猫城记》、15.老舍《离婚》、16.老舍《赵子曰》、17.老舍《老张的哲学》、18.老舍《二马》、19.张天翼《在城市里》、20.老舍《牛天赐传》、21.老舍《老牛破车》、22.王统照《春华》(即《春花》)23.老舍《火葬》、24.谢冰莹《女兵自传》、25.李广田《引力》、26.萧乾《珍珠光》、27.老舍《月牙集》、28.田涛《流亡图》、29.老舍《老舍戏剧集》、30.王西彦《微贱的人》、31.阿英《杨娥传》、32.老舍《骆驼祥子》、33.老舍《过新年》、34.(缺)35.阿英《剧艺日札》、36.周而复《翻身的年月》、37.(缺)38.周而复《子弟兵》、39.陶雄《伏虎冈》。

其中《月亮下去了》和《卡拉马助夫兄弟们》是从外文翻译过来的文学作品而其他的都是新文学创作。《月亮下去了》、《春花》、《在城市里》和《离婚》四种，和“良友文学丛书”重复了。这套丛书比较少见的是：王西彦的《村野恋人》、《微贱的人》和阿英的《杨娥传》等。

“晨光文学丛书”没有精装本，但平装本印行的版数甚多，每个版本的形式亦不尽相同，就扉页的设计来说，单“晨光文学丛书”这几个字，就有用大号字的，小号字的、黑体的、秀丽体和反白的多种；书脊上有编上号数的，也有没有编号的；出版社有在四川中路的，在哈尔滨路的也有。我相信这套丛书的翻印本和伪本比之“良友”多上数倍，哪些是原版本，实在很难辨认，非要专家鉴别不可。“晨光文学丛书”版本虽然很多，但封面却不离两种：大部分是右上角有由右至左的“晨光文学丛书”字样，书名在左面直排大反白字，作者排在书名下横置，右面则是一幅图案，有时是作者的素描。小部分是“晨光文学丛书”那几个字放在书的上部中央，跟着是横排的书名和作者，下半部是整幅图案，如：谢冰莹的《女兵自传》（根据良友版的《一个女兵的自传》增删修订而改写的）田涛的《流亡图》和老舍的《火葬》、《月牙集》和《离婚》等都是这个式样。

上文说这两套丛书极易混淆，问题就出在封面的设计上：一九四四年版的“良友”平装本，其封面设计和“晨光文学丛书”完全一样，所不同的，仅是右上角的“良友”和“晨光”两字，稍不留意，就会混乱。其实，原版本的“良友”平装不是这个样子的，“良友文学丛书”那几个字应反白印在书的正上方，书名在书的上部横排在左面，紧接着的右边是一个有颜色的矩形，作者名排在左面下部直排，右面亦有一幅图案。

不过，真正平装的、精装的“良友”版都很少，市面能找到的都是四四年的翻印本，而“晨光文学丛书”也是常见的，读者一不留神，就会混淆了。

关于这两套丛书，还要谈谈的就是那四本特大号的良友文学丛书，和晨光版的张天翼的《畸人集》。

“良友”自一九三五年下半年起，即计划出版“良友文学丛书特大本”，布面精装，外加封套，报纸印，每种七百至九百页，售价不定，先后出了张天翼的《畸人集》、巴金的《爱情三部曲》、沈从文的《从文小